第一章　家学渊源

一、书香世家

清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公元 1890年 7 月 3 日),在长沙市唐代散文家刘蜕的故宅传出几声婴儿的啼哭声，赁居在这里的丙辰年间进士陈三立家中又诞生了一位公子。由于这一年正值寅年,兄弟间排行字为恪,祖母黄太夫人便把这个男婴取名为寅恪。

陈家属客家民系,原来在福建上杭居住,到了寅恪的六世祖才举家迁往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奋力开辟新的生活天地。经过几代人的蕃衍和艰辛创业,到寅恪出世时,陈家已是义宁州很有名望的书香世家。陈寅恪后来曾对他的学生罗香林说过,从福建、广东迁去义宁的客家人,“多数以耕读为业,因为生性耐劳,勤于读书,所以考秀才的时候,本地人往往以学额被客家学子多分去了,便出而纷争”;后来由封疆大吏请准朝廷,另设‘怀远籍’学额,专给客家人应考,与原来的学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无关,这才把纷争平息。'陈寅恪一家"自他高祖胜远公,以至他父亲伯严先生(三立)都是由'怀远籍'入学,以至逐级考获各种高科的。'[①]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耕文化的社会，自宋代以后,相当多的读书人都来自农村,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读书，然后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陈寅恪的高祖陈克绳、曾祖陈伟琳所走的也是这条耕读道路,他们虽然通过童试"入学"作了生员,但并未外出做官。由于陈寅恪的高祖母'体羸多病",陈伟琳除了躬耕田陇和苦读儒家典籍外,还'究心医家言,穷极灵枢素问之精蕴,遂以能医名。病者踵门求治,望色切脉,施诊无倦。'[②] 陈寅恪晚年回忆说："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为人疗病",称'中医之学乃吾家学。'[③]不仅如此，陈伟琳还创办义宁书院，招徒授学，在地方上很受人尊重。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字右铭，1851 年 21 岁时参加乡试,得中举人。但是他没有马上进京参加会试,而是协助乃父陈伟琳办理地方团练，抵御太平军的进攻。直到 1860 年,他才离家进京参加会试。不料,名落孙山,便淹留北京,打算再参加三年后的下一科会试。陈宝箴在北京期间，正逢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北京,纵火焚烧圆明园之时。他在酒店望见燎天火焰,难压心头愤怒,捶桌悲号,震撼了满店人的心灵。第二年陈宝箴回湖南探视母亲后，拜会了屯兵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化解了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之间的不睦关系。他的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曾国藩所赏识,称他为'海内奇士也"。曾国藩送他一副对联，其中有句云"半杯旨酒待君温",足见其器重的程度。不过,当时陈宝箴没有久留曾国藩

的幕府,而是到江西席宝田大营参赞策划军务,屡出奇计,立下大功。虽然席宝田叙功向朝廷保举他为知府，但他并未接受,却又回到曾国藩幕府,时常与曾国藩谈诗论文。曾国藩的外曾孙俞大维说:"曾文正公又有与陈宝箴太守论文书,此文收入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中。"[④]在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陈宝箴才"以家贫养亲,不得已而就末职。"[⑤]先后担任过署理湘西辰、永、沅、靖道事,河北道,浙江按察使,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等职务。他在仕途中,以卓越的才干和优异的政绩颇受朝廷的看重。不过，与他交往密切的还是士大夫中的清流如李鸿藻、翁同龢、陈宝琛、张之洞、谭继洵、郭嵩焘、黄遵宪等人。这些士大夫又都是洋务派或维新派中的中坚人物。

陈宝箴又深受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影响,为人刚正不阿,具有强烈的爱国感情。在晚清政坛上，李鸿章是权倾一时的显贵人物。甲午海战以后，陈宝箴严厉谴责李鸿章"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畏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室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⑥]当李鸿章从日本返回天津时，众人议论李会再次出任直隶总督。正在天津督东征湘军转运的陈宝箴愤然不去拜见,并且扬言,如果李鸿章早上担任直隶总督,他当晚就挂冠而去。[⑦]在黑暗污浊的晚清官场，陈宝箴正气凛然，真是难得。

陈宝箴虽然恪守儒家学说，但思想却很开放。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他奉诏担任湖南巡抚,在蹇涩多年之后,终于有了独当一面、大展鸿图的机会。他在湖南,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整饬吏治,裁汰冗员,罢免昏庸贪鄙的官吏,兴办工商实

业,浚疏河道,开办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以开迪民智、改变陈旧的风俗。当时,黄遵宪来湖南主持盐法道,梁启超受聘主持时务学堂教席;“皆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8]不仅如此，他还向光绪皇帝上书，力荐张之洞入执掌军国大权的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和京外官员三十余人备光绪皇帝挑选。其中所举荐的杨锐、刘光第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军机章京，与谭嗣同、林旭并列为军机四章京。陈宝箴任湖南巡抚三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本来他还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但戊戌政变失败后，慈禧太后等守旧势力剥夺了光绪皇帝一切权力，杀了军机四章京。陈宝箴因拥护光绪皇帝变法,被视为“帝党”和维新党,成为慈禧太后的眼中钉,本应受到严惩，但因荣禄等人在慈禧面前磕头求情，才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1898 年，陈宝箴被罢官后，在江西南昌西山建“秆庐”居住。但心狠手辣的慈禧最终没有放过他，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夕，1900 年 6 月 26 日密诏令他自尽。关于陈宝箴之死,近人戴明震先父远传翁(字普之)《文录》手稿有一段记载：

>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涛驰往西山“峭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9]

密旨大臣赐死,是慈禧消灭对头的惯用手法之一,著者认为上述记载是可靠的。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官拜吏部主事。他觉得京城官场,腐败成风,难以有所作为,不久便以侍候父亲的理由离开吏部,到陈宝箴衙门协助处理公务。那时陈三立正当壮年,风华正茂,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以改革天下为己任,同时又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中吸取营养,主张维新变法。他与一些思想开明的官员、文士如黄遵宪、郭嵩焘、罗正钧、梁启超、严复等人交往,或纵谈国家大事,为民族复兴设计蓝图 或论诗话文,切磋学术 视功名利禄为草芥。甲午战争失败后,他与乃父陈宝箴同一步调,在李鸿章出使日本返国之际,于 1895 年 5 月 17 日致电父执、两江总督张之洞:

> 读铣电愈出愈奇,国无可为矣。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维赐察。
>
> 三立[10]

忠贞爱国之心和悲怛愤激之情溢于纸上。以一小小离职京官,请诛位高权重的大臣,这是何等胆识。难怪人们把他同谭嗣同、丁慧康和吴保初称为晚清四公子。[11] 不过,他在政治活动中的最大建树,还是辅佐父亲在湖南所推行的新政。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父子通力合作,开创维新的新局面,使昔日闭塞、落后的湖南百废俱兴,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12] 恰如梁启超所说“:义宁湘中治迹,多其所赞画。’[13] 陈宝箴来自江西义宁,人称义宁先生。陈宝箴治理湖南,采用了陈三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许多主意，湖南所推行的新政，自然也有陈三立的一份贡献。不料,政坛风云突变,戊戌变法的失败,也使陈三立受到革职处分,远大的抱负尽付东流。

陈三立虽然与乃父陈宝箴在南昌赋闲，但仍很关心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益切忧时爱国之心,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对欷歔,不能自已。”[14]直至陈宝箴被慈禧太后密旨赐死，陈三立才决意退出政治，栖身江湖。他在《赠梁启超》诗中说“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表明他对政治绝望后的生活态度。所以“后虽复官，迄清之末，未尝一出。”[15]例如原拟定他为湖南提学史，他坚辞不受。民国初年，座师陈宝琛任已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的师傅，想请他进京协助自己。这是一般遗老求之不得的差使，但他却以不会说北京话的理由婉谢了。[16]当然，陈三立的血管里流动的毕竟是中国人的血，他不可能永远作“神州袖手人”。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后，北平被日本军队占领，他忧愤成病，绝食而死。弥留时还关心地问：外面传说中国军队在市郊马厂一带打了胜仗的消息是真的吗？陈三立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为生命着上最光彩的最后一笔。

晚清政坛何其不幸,少了一个满腹经纶的官员 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诗坛又何其有幸，多了一位卓有才华的领袖。政治上的失意和父亲被迫自缢是转变陈三立生活的契机。自 1900 年在南京定居后，他就把主要精力用在诗歌创作上。陈三立早年诗学韩愈、龚自珍,后来又深受南北朝和宋代诗歌的影响，特别是学习和继承了以黄庭坚为台柱的宋诗江西派的传统，融注成为自己的风格。他的诗歌创作代表了同光体诗

派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他在清末和民国初年诗坛的泰斗地位。[17]梁启超评论他的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18]陈三立的古文兼有《后汉书》、《三国志》的长处，绵密精炼又含蕴着桐城派注重义理、书卷、考据和行文雅洁的特点，自成一家。他著作颇丰，逝世后由几位儿子集聚时编定有《散原精舍诗集》二卷，《续集》三卷，《别集》一卷。《文集》十七卷，由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出版。

长兄陈衡恪，字师曾，比陈寅恪大14岁。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春天，被父亲送往上海一家法国教会办的学校学习，翌年春天东渡日本求学，后来毕业于日本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系，归国后在北京教育部任编纂。衡恪多才多艺，诗、画、金石篆刻无一不精，堪称三绝，名满京师。1917年，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画家齐白石初到北京。正是得到衡恪的指点和帮助，齐白石的画技才有长足进步，白石老人的画方使天下倾倒。陈衡恪与齐白石的交往，至今被美术界传为美谈。惜乎天不与寿，正当他朝更高的艺术境界迈进时，1923年便遽然长逝，享年48岁。

次兄陈隆恪，比陈寅恪大两岁，按陈氏家族的大排行为第五，所以寅恪称他为五兄。1888年（光绪十四年）出生于长沙。1904年与寅恪同时考取官费留日。开初他在日本庆应大学读书，后来转入东京帝国大学财商系学习。1912年学成归国后一直从事财经工作，是陈三立同年进士喻兆藩的乘龙快婿。1951年经齐燕铭介绍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隆恪虽学财经，但诗也写得很好，著有《同照阁诗抄》传世。

1956 年病逝于上海,享年 68 岁。

七弟陈方格,小陈寅恪一岁,1891 年(光绪十七年)出生。方恪虽未出国留学,但因受家风熏陶,国学功底深厚,精通目录学,对书法和诗词下过很深的功夫。1949年以后,长期在南京图书馆工作,又担任过南京市政协委员和江苏省政协委员。1966 年病故。

八弟陈登恪,小陈寅恪 7 岁,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出生。1919 年从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前往巴黎钻研法国文学。他的一位老同学回忆说,陈登恪“谈论时略有口吃之病,然颇多风趣,形容细致,令人解颐。”[19]1949 年以后一直在武汉大学任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受迫害是免不了的。他没有活到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天,1974 年去世。

可见义宁陈家世代书香,满门俊彦,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学术等方面和中国文化,都做出了贡献。

二、幼承家学

陈家一向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开设家塾,延聘名师,使子孙很早就发蒙读书。陈宝箴于 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8 月官拜湖南巡抚,举家迁往长沙。也就在这一年,六岁的陈寅恪入家塾跟着湘潭宿儒周大烈《字印昆》读书。1898 年陈宝箴、陈三立被罢官后,更把心血倾注在子孙身上。陈宝箴曾书扇训示隆恪:

读书当先正志;志在学为圣贤,则凡所读之书,圣贤

言语便当奉为师法，立心行事俱要依他做法，务求言行无愧为圣贤之徒。经史中所载古人事迹，善者可以为法，恶者可以为戒，勿徒口头读过。如此立志，久暂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趋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针，不致误入旁径，虽未遽是圣贤，亦不失为坦荡之君子矣。君子之心公，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皆吾学中所应有之事。故隐居求志则积德累行，行义达道则致君泽民，志定则然也。小人之心私，自私自利，虽父母兄弟有不顾，况民、物乎？此则宜痛戒也。

四觉老人书示隆恪[21]

陈宝箴的书扇训示在于教育后人如何读书做人，这段文字尽得《中庸》中"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22]和《大学》所倡扬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等自我道德修养的真髓，把立下学习古代圣贤的志向，按照圣贤的道德标准立身处事，努力争取作圣贤之徒，当作读书求知的第一要务。而要做到这一点，他谆谆告诫要从经史著作关于古人事迹的记载中去寻求，"善者可以为法，恶者可以为戒"，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勿徒口头读过"。陈宝箴的书扇训示，其实也是对陈隆恪兄弟们的家训，成为他们日后读书做人的准则。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都具有很深厚的国学修养，尤其是陈三立，学承乾嘉之风，文属湘乡一派，诗树同光体江西诗派一帜，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文坛上颇有建树。陈氏兄弟又都非常聪明，其中寅恪的理解力、记忆力、观察力、思辨力特别强，

悟性特别高。陈三立因材施教，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发展各自的天性和爱好。在祖父和父亲的熏陶下，陈寅恪从小就对经学、史学、文学、哲学、医学和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勤奋好学是陈家的家风，陈寅恪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陈家和他的舅父俞家藏书都非常丰富，两家的书房便成为他流连忘返的乐园。他的侄儿陈封雄回忆说："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2]

和当时许多读书人不一样，陈寅恪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为求知识而求知识。他幼承家训，很早就把读书同正心、立志、做人结合起来，为了通晓古人的事迹，他在少年学习经学、史学著作时，下过一番苦功夫。关于这一点，他的表弟和妹夫俞大维在回忆中特别指出："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3]"《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4]《十三经》包括《诗》、《书》、《易》、《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传》、《穀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等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著作，经过历代读书人的阐发和议论，形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正统地位的经学。俞大维所说的《皇清经解》，是道光年间两广总督阮元收集清初至乾隆、嘉庆年间训释儒家经学著作 74 家，180 余种，360 册，1412 卷汇编而成的丛书。这套丛书既搜集了清代学者考订训释的成果，又映现了从清初到乾隆、嘉庆年间经学的演变过程。《续皇清经解》

则是光绪年间江苏学政王先谦收集《皇清经解》所遗漏的学者和乾隆、嘉庆年间以后的 111 家经学著作。这套丛书以收乾嘉学派著作为主,同时也收入不少其他学者的著作,共计 209 种,1430 卷。而所谓《三通》,则是指唐德宗时宰相杜佑编撰的,记述我国古代经济、政治制度的沿革变迁的《通典》南宋郑樵编撰的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发展变化的纪传体通史《通志》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海撰写的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鸿篇巨制《文献通考》。在中国史学上,《三通》是极有价值的著作。

怎样正心、立志和做人,正是经史著作所阐发的主要内容之一。陈寅恪在苦读经史著作时,经学中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尤其是儒家的纲纪之说,濡染了他幼小的心灵。同时,他也接受了以礼为根本的立身之道和行为规范。正如俞大维所说:"寅恪先生认为'礼'与'法'为稳定社会的因素。礼法虽随时俗而变更,至于礼之根本,则终不可废。"[1]不仅史书上所记载的圣贤事迹是他学习的榜样,陈三立廉正高洁的品行和在仕途遭受挫折后仍保持文人的操守,更被他当作生活中效法的楷模。陈寅恪在少年时代所认同的儒家伦理观念,日后成为他文化人格的核心、学术精神的强有力的支柱、道德修养的基础、言行举止的准则,对他一生都起着制约作用。

在陈三立的导引下,陈寅恪不仅喜欢读书,而且也善于读书。他通经治史,基本上是依着乾嘉汉学中皖派的路子 那就是以文字学为基点,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研究儒家经典著作本文的涵义。他从小就受过小学(训诂、音韵、文字)的严格训练,养成酷爱文字的癖好和勤于分析、思考、考证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习惯。正如俞大维所说“:关于国学,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2]《说文》为东汉许慎所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该书以小篆为主体,收进大量古字古义,是研究古代典籍和古文字必读的入门书之一，对后代学者影响深远。高邮王氏父子,就是籍贯江苏高邮的清代著名经学家、音韵学家、训诂学家、校勘学家王念孙和他的儿子王引之。王念孙为乾嘉汉学中皖派大师戴震的传人，擅长以古音求古义，对古代典籍中文字的假借、声音的通转都很有研究，在运用内证法校勘订正古书中的讹误、注疏前人的疑义等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所著《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等书,超越了前人。王引之精通训诂考据,所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都颇有见地,对后来的经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不无启迪作用。王氏父子的著作，对学人研读经史，深入钻研国学另辟了一条新径。陈寅恪钻研他们的著作，学到他们遍搜博引、注重实证、辨伪识真、比较分析、溯源达流、触类旁通和缜密推导等治学方法，为他日后形成治学严谨、考据详博求实、敢于突破前人学说、阐发己见的质朴学术风格，铺下坚实的基石。后来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掌握德、英、日、法、藏、梵文等十几种文字,未尝不是来源于此时所萌生的对语言文字的特殊兴趣和爱好；他运用多种文字研究中国文化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未尝不是得益于早年在小学(音韵、训诂、文字)方面的磨砺功夫。

考察陈氏家世，不难看出从陈寅恪的高祖陈克绳到陈三立,都是务实的人。笃定、务实,也可以说是陈氏的另一种家庭风气。这种家庭风气，培育着陈寅恪不囿于经书和已有定

论的存疑精神以及锲而不舍，寻根究底的学术品格。这是日后他成为蜚声中外的一代宗师的基本要素之一。少年时代的陈寅恪,是个爱思索和体弱多病的孩子。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精通中医，他自己生病时也大抵服用祖父和父亲所处方的药。他在五六岁时，亲眼看见祖父给湖北巡抚谭继洵治好所患重病后，谭继洵厚馈的鱼翅、酒和五百两银票，为祖父给人治好病竟然得到如此丰厚的酬报而惊讶，从此对中医怀有一种好奇心。十岁时听祖父闲话往事“昔年自京师返义宁乡居,先曾祖母告之曰,前患咳嗽,适门外有以人参求售者,购服之即愈。先祖诧曰，吾家素贫，人参价贵，售者肯以贱价出卖,此必非人参,乃荠苨也。盖荠苨似人参，而能治咳嗽之病，《本草》所载甚明,特世人未尝注意及之耳。”[19]饶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听完这个故事后,竟特意查阅《本草纲目》“,即检荠苨一药,果与先祖父之言符。”[20]对敬爱的祖父所说的话尚须经过查证方才确信，他早年的存疑求实精神由此可见其端倪。不仅如此，在对待被他称为三世家学的中医之学，也同样体现了这种精神。中医之学曾长期被视为国粹。陈寅恪少年时浏览过许多医学古籍,发现中医理论和药方,有不少是从域外传入的,对中医乃“国粹”的论调大胆质疑“:若矜夸以为国粹,驾于外国医学之上，则昧于吾国医学之历史，殆可谓数典忘祖欤?”[21]同时，他又认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若格于时代及地区,不得已而用之,则可。”而且正是由于他无法穷通中医治病的道理,所以他不相信中医,也不敢以中医给人治病。姑且不论陈寅恪对中医的看法有什么偏颇之处，但至少可以说明,即使是对祖传家学,他也不“唯书”,不“唯上”,甚至

宁可背上‘世所称不肖之子孙’之名,在没有真正弄清楚中医理论之前,一直坚持‘今转不信之’的态度和‘吾家渐不用中医’[⑧]的作法。他少年时代对中医的看法,在后来所写的《〈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崔浩与寇谦之》、《元白诗笺证稿》等论文和论著中得以充分发挥,形成新颖独到的见解,为后人所折服。他从小就形成的存疑求是精神,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大放光彩,使他既摄纳前人研究成果的精粹,又不盲从前人的学说,思想解放,勇于探索,勤于独立思考,独具只眼,洞幽烛微,敢于提出前人没有发现、或者同前人见解相反的观点。

杜甫有诗云‘诗是吾家事’,[⑨]‘吾祖诗冠古’,[⑩]道明他的诗歌成就与家学的渊源关系。如果把杜甫这两句诗移到陈家来,也是恰当的。祖父陈宝箴固然没有杜甫的祖父杜审言那样大的文名,留下的诗文篇章并不多,而且多为奏疏一类的时文,但就从这些时文中也可看出陈宝箴扎实的文学功底。陈三立是清末和民国初年诗坛巨擘自不必说了,他的文章也写得很精妙。寅恪的母亲俞明诗也出身于书香世家,有才学,有见识。他们时常给寅恪兄弟讲解诗文,使这些孩子的心灵很早就受到文学之风的拂煦。 1947 年,58 岁的陈寅恪还怀着温馨的心情在诗中追忆 11 岁时母亲教他读南宋词人姜白石的《鹧鸪天》中‘柳悭梅小未教知’诗句时的情景。陈三立的审美趣味显然影响了寅恪兄弟。在他的指点下,寅恪学诗以学宋诗为主,但不局限于宋诗。宋诗自王禹偁以来,就很注重向杜甫、白居易等唐代诗人学习,久而久之,成为宋代诗坛的一种风气。陈寅恪也是这样。正如俞大维所说:‘诗,寅恪先生佩

服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29]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香山。'[30]在宋诗中，寅恪特别喜好苏轼、黄庭坚等诗人的作品。苏轼诗歌的旷达奔放、想象丰富、风韵飘逸,黄庭坚诗歌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笔致细密，滋润着陈寅恪的诗情才思。而陈三立诗歌的空灵缥缈、莽苍排奡、用字新奇,对寅恪的诗歌创作更是有着直接影响。至于文章,他在少年时代埋头读过韩愈、欧阳修、王安石、归有光、姚鼐、曾国藩等古文大家的著作,兼取唐宋八大家、桐城派、湘乡派之长,在作文的义理、章法、用语、考证等方面,又深得陈三立的真传。他后来所写的文章纤舒平淡、言简意赅、义深旨远、古朴清瘦、考证严密、析理透彻、无一冗言赘语,这与他从小所受到的良好训练，有极大的关系。

陈氏家塾对陈寅恪的成长，也产生过重要影响。1901 年陈三立挈眷将雏在南京定居，刚一安顿下来，就办起了家塾，“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亲戚朋友家子弟也附学。(如茅以昇、茅以南兄弟等)'[31]陈三立毕竟是维新派人士，陈氏家塾和当时许多名门望族所开设的家塾不同，办得很有特色。陈三立先后聘请王伯沆、柳翼谋、萧屋泉等著名学人担任教师。在教学安排上,四书五经占了很大的比重,教学内容以国学基础知识为主，体现了陈三立以中学为本位的思想。但家塾同时又设立数学、外文、音乐、绘画和文体等课程,在教学中融入了西方科学文化的基本知识。陈寅恪晚年曾说“:小时在家塾读书，又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32]指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陈氏家塾的教育方法,使寅恪受益匪浅:一方面他在这里接受比较系统的国学教育，从小就打下坚实的中国文

化知识的基础,虽然以后他留学欧美多年,涉猎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书籍，但他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却始终没有动摇过。另一方面，使他自幼对西方文化兼收并蓄，取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之长，补中国传统文化之短。这不仅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而且也使他在童稚之年就形成融汇中西方文化知识的开放心理和合理的知识结构,为他日后学贯中西,作了充分的准备。

三、学术源流

陈寅恪的祖父和父亲以其才识、能力和品德,跻身于晚清上流社会，不但与一些重臣名宦中的清流关系非常密切，而且还同一些在野的文人名士有很深的交谊。陈寅恪说：“至寒家在清季数十年间，与朝野各方多所关涉。”[6]寅恪长兄衡恪的岳父范当世，也是近代著名诗人。祖父和父亲与他们志趣相投，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子。这个文化圈对陈寅恪兄弟的成长,起着良好的作用。所以陈寅恪又说“:父执姻亲多为当时胜流,但不敢冒昧谒见,偶以机缘,得接其丰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7]

在这个文化圈中，尤以曾国藩、张之洞的名望最高。曾、张二人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功过是非各有一本帐，自有后人评说。不过,平心而论,在晚清政坛上,他们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股肱辅臣。他们努力倡导和推行的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历程的最初尝试。曾国藩既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强调儒家学说是中国人安身

立命的根本又敏锐地觉察到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是中国富国强兵的必然途径，对外来文化持欢迎态度。张之洞响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17]曾国藩、张之洞突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夷夏”观念陈旧而坚固的藩篱，在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的前提下，主张以儒家文化思想为本体，学习和吸收西方科技文化和人文科学的某些内容，革新和重构民族文化，促使国家朝富强的道路迈进。在曾国藩等人的努力下，古老的中国文化也一度焕发出新的生机。曾国藩、张之洞的主张，得到统治集团中比较开明的读书人士的认同，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

曾国藩、张之洞不仅是洋务派的领袖,而且还是同治以来晚清文坛的主将。曾国藩推崇桐城派古文，利用自己在政坛上的地位，积极从事振兴桐城派的文学活动，并且卓有建树。他虽然很欣赏桐城派讲求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宗旨，但同时又看到这个宗旨的缺陷和桐城派所存在的空疏浅陋的弊病,提出古文写作除坚持义理、考据、词章而外,还应注重“经济”——应时实用、经世致用的主张加以补充，自立门户成为湘乡派的创始者。在诗歌方面,曾国藩提倡效法宋诗、主要是学习黄庭坚的宋诗运动。张之洞则对轻浮纤佻、诘屈怪僻的诗风不屑一顾。他从唐人诗歌中吸取营养,博采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宋代诗人的长处,又扬弃乾嘉诗风,独辟蹊径,在诗歌创作中另树一帜。由于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所以在同治、光绪年代的经济、科技、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